

溢出的灾害：为什么一个更会保护的体系，反而制造了它防不住的东西

堤没坏，标准执行得无可挑剔，但水从它头顶过去了——那些水在图纸阶段
就已被写进去

孔凡鹤 著 · SDE 学员 · 灾害治理与组织社会学 · 2026年7月26日

摘要 本文提出一个关于灾害如何被社会系统制造的生成论判断：现代灾害治理的真正困境，不在于防护的失灵，而在于防护的逻辑本身在制造着它所无法覆盖的牺牲。这个判断要切开的辨别面，是既有灾害理论和组织社会学都尚未独立命名的机制：一个社会系统越是在其认定的“可防御区间”内努力优化——划定哪些对象必须被保护、哪些风险最值得投入、哪些操作可以被考核——它就越是在这个区间之外制造出一个自己决定不了、也防不住的边界。本文的分析将论证，这个机制不能被还原为默顿式的“意外后果”（那是系统未曾预料的结果），也不能被等同于贝克式的“反身性风险”（那是成功的现代化对自身的威胁，最终会砸回制造者头上）。它要命名的是第三种情形：系统在清晰认知、严格程序、尽职尽责的框架内，将有意识放弃的对象划入一个不再主张责任的“让渡区”。这些对象不是被遗漏，而是在认知层面被定义为“不在保护定义之内”。这种让渡，在灾害来临时一次性清偿。本文将这种机制命名为“溢出”——就像洪水漫过一道没有溃坝、完好无损却只修到三米高的堤顶。堤没坏，标准执行得无可挑剔，但水从它头顶过去了。堤在被设计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决定只能挡住某些水；那些注定要从它头顶漫过去的水和因此而死的人，不是堤的故障，而是堤在设计阶段就被写进图纸的、沉默的、无法事后追责的牺牲品。本文以2023年北京“23·7”特大暴雨洪涝灾害为公开材料背景下的贯穿性案例分析，追踪这条溢出链的完整发生过程：从标准化达标如何将独居老人移出预警体系、到成本收益核算如何在河堤加固的优先排序中将深山村庄推至末端、再到那些被制度判定为“不规范”的邻里互助如何在优化进程中被成片剪除。本文进一步论证，制度不止在筛选“保护谁”，它更在剪除那些本可以吸纳灾害冲击的“社会缓冲层”——正是这种三重剪除，才构成了从“被制度让渡”到“在灾害中丧命”的必然性链条。最后，本文回应“我们难道要放弃标准与审计吗”这一反驳，划定批判的边界，并在结尾给出该判断的证伪条件：如果未来同等物理强度的灾害，在不同地区的后果分布不再能够依据“被溢出的人口比例”与“制度性截断的缓冲层”来事前预测，则本文所揭示的“溢出”机制将失去其解释力。

关键词：溢出；灾害生成论；可防御区间；社会缓冲层的制度性剪除；非预期让渡

一、引言：堤在哪里，水就从哪里过

风暴的公平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事实。从气象学上看，一场台风或特大暴雨在它所扫过的区域内，最大风速和小时降雨量的空间分布差异，并不像人们直觉以为的那样巨大。同一个夜晚，同一个城市的两个街区，承受的风力与雨量相差无几。可天亮之后，这两个街区的命运却被撕开了令人费解的缝隙：一边只是扫落几根断枝，居民抱怨一夜没睡好；另一边房子塌了，人没了，毕生积蓄泡在泥水里，往后几十年的生命轨迹被连根改写。

面对这道缝隙，公共话语和许多学术研究通常会递过来一个词：“脆弱性”。这个解释路径的大致逻辑是：灾害后果的分布差异，不过是受灾体自身脆弱程度的自然映照——你弱，所以你倒；你穷，所以你死。这个判断本身没有说错，但它在解释上几乎无法再往前推进一步。说一个人受灾重，是因为他脆弱；要证明他脆弱，你拿出的证据还是他受灾重。把一个需要被追问的问题，换成了一个听着像答案的词——这是“脆弱性”作为一个解释框架中最令人不安的循环。

灾害社会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已经为打破这个循环做了大量工作，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但倘若不愿止步于此，更尖锐的问题就逼到眼前：为什么一个在许多看来理应受到保护的人，会恰好住在那间地基紧贴河岸的房子里？他是一步一步怎么走进去的？是谁、用什么规则、在执行什么看似毫不相干的任务时，把他推到了那个再无退路的位置？

追问的矛头，从自然灾害的物理属性，转向社会制度在漫长时间里的运作纹理。当“砖头掉下来，砸死人了”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意外。但如果有人日复一日地在同一堵危墙下摆摊——规划许可被拒，便只能在此谋生；危墙贴了告示，却未设隔离；巡查的责任人按期完成了拍照上传，在台账上标记为“正常”——那么当砖头终于掉下来，砸死的就不再是一个意外击中的人，而是被一整套无懈可击的制度操作一步步推到那块砖头正下方的人。本文要追问的，正是这种“推到砖头下”的机制。

这个追问的起点是一个看似悖谬的经验观察：一个社会系统，在其追求“更好”的时候——更精确地识别风险对象、更高效地配置防护资源、更严密地考核达标绩效——恰恰可能在制造着它所无法覆盖的牺牲。这不是出于恶意。防汛责任人把沙袋准时运到了指定位点，水利工程师为保护经济核心区设计了二十年一遇的堤防，预警信息以创纪录的速度完成了百万级终端的覆盖。这些人没有偷懒，没有草菅人命的意图。他们很负责、很精确、很辛苦。

可风暴来临时，沙袋挡不住漫过堤顶的洪水；经济核心区安然无恙，上游深山里的老村却被整栋冲毁；预警信息送达了千万台智能手机，而那位独居在信号盲区、手里只有一台老年机的老人，直到洪水灌进屋子也没接到任何消息。

这些后果不能被解释为“标准化失灵”或“核算出错”。恰恰相反，它们是在标准化严格运行、核算精准执行的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把沙袋准时运到指定点位的那个执行，与上游老村被放弃的加固投入，是同一个决策系统的两面。向千万台智能终端推送预警的那个达标率，与山区老人所处的绝对信息真空，是同一套通讯覆盖逻辑的必然产出。不是系统坏了。是系统在它为自己划定的可防御区间之内运转得太好，以至于区间之外的一切，被制度性地排除在“保护能力”的定义范围之外——不是“有余力却没保护”，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在保护的定义里”。

本文因此提出一个精确的辨别维度，用以区分几类被混淆已久的灾害制造机制。在本文的分析中，分配指的是不平等的风险后果在社会群体之间不均衡地分布；生产指的是社会结构本身的运作在持续制造着特定人群的脆弱性；意外后果（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指的是行动者的理性行为，在聚合或脱嵌后产生了与局部目标相悖的总体结果——默顿的科层制目标置换与吉登斯的脱域风险是这一类分析的典范；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指的是成功的现代化在制造繁荣的同时也制造出跨越阶层界限的、不可计算的新型威胁，其经典表述见贝克的《风险社会》。这些机制都是真实的，本文并不否认它们。但本文要论证的是，在上述机制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更隐蔽的机制，它尚未被独立地命名和系统追踪。

本文将这种机制称为“溢出”。一个堤坝没有溃决。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标准被严格执行，工程验收合格，审计清清白白。可当三十年一遇的洪水到来时，水从堤顶上漫过去了。堤仍然完好，标准无可指摘。但下游的村庄被淹没。谁出的错？堤是被按照“不出错”的逻辑设计和施工的——它确实没有出过任何在设计标准内的错。可它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了一道只能挡住某些水、而必然让另一些水过去的屏障。那些被让过去的水和因此而死的人，不是堤的“故障”。他们是这道屏障在设计阶段被写进图纸的、沉默的、无法事后追责的牺牲品。

“溢出”这个概念要捕捉的，正是这种精确的、有据可查的、在尽职尽责的框架内完成的让渡。它不是在指责任何一个决策者草菅人命，而是要揭开一个更令人不适的制度事实：现代灾害治理，在其追求更精确、更高效、更负责任的进程中，并不只是“漏掉”了一些人。通过一次次的达标、一笔笔的审核，某些人口与社区被主动地——并且是合法合规地——划入了一个系统不再对其安全主张责任的区间。在灾害到来的那一夜，他们不是系统来不及救的人。他们是系统在漫长的日常运转中，被一笔一笔正式地让渡出去的人。

在进入正文之前，有一笔必要的交代。这篇论文不是一份政策建议书。它不是在主张推倒堤坝、退回前现代。它要做的事情始终如一：把那个在我们尽职尽责、努力变得更好的过程中，被一点一点地让渡出去的边界指认清楚，给它一个名字，并追索出它在制度操作链条上留下的具体指纹。看见它，是改变它的第一步。

二、被让渡的空间：为什么“溢出”不是一个已知概念的新说法

在展开本文的分析框架之前，有必要先为“溢出”这个概念廓清它的理论战场。灾害研究过去一个世纪走过了一条从“自然事件”到“社会建构”的认识论道路。这条路走到今天，“自然灾害不天然”这句话已经因为说得太多，而被磨掉了最初的锋利。但本文要做的不是再复述一遍这个命题，而是在这条路上，为“溢出”精准定位它要切开的那道缝——它之所以不是既有理论中已有概念的简单重述，正是因为它要命名的是一个被反复逼近却未被切开的辨别面。

2.1 从“自然的火”到“社会的柴”：一个未完成的转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灾害被理解为物理学和地质学的事情。地震、洪水、台风——它们是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外力”。在这个框架下，灾害后果的差异被方便地归结为两个因素：外力本身的随机性，以及受灾体天然属性的差异。有的地方就是更“易受灾”，有些人就是更“脆弱”。一切都是命运的偶然。

这个解释框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撬开了第一道缝。O' Keefe、Westgate和Wisner三人于1976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拿走自然灾害中的“自然”》的短文。通过全球灾害数据库，他们论证了灾害死亡人数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显著的高度负相关关系。结论简洁而有力：人不是被地震或洪水杀死的，而是被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杀死的。灾害的“自然性”被第一次系统地剥离。

这个剥离动作在1994年被整合为灾害社会学的经典范式。Blaikie等人的《风险地图》（At Risk）提出了“压力与释放”模型（Pressure and Release, PAR），将灾害的发生视为从“根原因”（权力、阶级、资源分配）经“动态压力”（快速城市化、缺乏地方制度、环境退化）到“不安全条件”（居住在危险地点、脆弱房屋、低收入）的三层叠加结果。致灾因子打击在一个已经不安全的社会体上，灾害就此发生。脆弱性不是一个固有属性，它是被一层一层压在人身上的。

PAR模型将研究重心从致灾因子身上成功挪开，转向了社会结构本身。但用本文的分析眼光重看，这个挪动是一场直到今天仍未完成的转移。PAR模型的核心判断可以被简化为这样一句话：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因为住得离危险更近、房子更不结实、信息更不灵通，所以灾害来了他们受害更重。这个判断成立，也被大量经验数据支撑。但它在解释上的深度就停在了这里：它告诉我，因为某些“条件”，某些人被暴露在风险之中。它描述了一个静态的暴露地图，却没有真正追踪这些条件是怎么被一步一个操作地制造出来的——“不安全条件”是“动态压力”制造的，可“动态压力”又是怎么在一次预算会议的排序里、在一份考核表格的指标设计中、在一套标准操作程序的

编写时，被精确地执行出来的？这条路，PAR模型没有再往下走。

2.2 “生产”转向及其未竟之业：接近了，但切口不同

后续的危害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来填补这条路。Wisner等人发展的“获取模型”（Access Model）是一个重要的推进。它不再只问“谁脆弱”，而是追索不同社会群体在获取土地、信息、援助、合法身份等关键资源时，路径的长短与门槛的高低。它指出，脆弱性的分布不是静态的“条件”，而是在一次次获取的受阻中被动态地生产出来的。这个“生产”转向，和本文要推进的分析已经很接近了。

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来自贝克的“风险社会”论。贝克论证了现代性本身——连同它的工业技术、科学理性与制度安排——在制造繁荣的同时也制造着跨越阶层界限的、不可计算的新型风险。他关于专家系统如何将风险转嫁给公众、以及风险最终以“飞去来器效应”砸回制造者自身的洞见，对本文理解制度的自反性有直接启发。但贝克的理论重心落在现代化风险的宏观逻辑与社会心理上，他用“反身性”（reflexivity）来命名现代性在成功中自我威胁的机制。本文要切入的分析层面更微观，更具体地聚焦于灾害治理的操作链条。

更有力的对手是默顿。默顿在二十世纪中叶对科层制的经典解剖，已经揭示了官僚系统如何通过“规则遵守”这种最尽职的行为，造成原初目标的失落。他称为“目标置换”：遵守规则本身成了终极目标，而规则设计之初想要成就的那个更大的目的被遗忘了。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批判的“不出错”逻辑，确实与默顿所言有某种家族相似性，这一点不应否认。

另一个常被拿来与本文问题意识关联的理论脉络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斯科特详细论证了国家推行的标准化、简单化项目如何系统性地消除地方性知识与非正式实践，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读者在读完本文后完全有理由问：你说的“溢出”，不就是斯科特已经说过的吗？

2.3 “溢出”要切开的新辨别面：被让渡的，而非被遗忘的

面对这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本文必须精确地陈述“溢出”不可还原为它们的原因。这个陈述本身就是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

第一，与默顿“意外后果”的区别——不在因果链上，在认知层上。默顿的意外后果，发生在制度的因果链条上：行动者按照理性规则行事，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产生某种远方的、总体性的非预期结果。这个“没有想到”是关键——意外后果之所以“意外”，是因为它在因果上未被预知。如果一个科层组织事先知道，把规则遵守奉为最高准则会导致目标置换，它或许会调整制度设计来规避这一点。“意外”是可修正的。

而本文的“溢出”是另一回事。它不是系统“没想到”的后果。它恰恰是系统在清晰认知的前提下，通过标准明确界定为“职责范围外”、通过核算明确界定为“不划算”，经过审计窗口签字画押之后，被有意识地、在程序正义框架内主动放弃的那一部分。它不是在制度的因果链上“意外地”滑落出去的——它是在制度的认知框里，从一开始就不在“可防御”的定义之内。不是“来不及预警”，而是“在预警覆盖率指标的统计口径里，这台老年机不构成一个必须触达的端点”。这是完全不同的机制。默顿讲的是目标被程序取代；本文讲的是，当程序被正当化、精细化地执行时，它所划出的“可防御对象”的边界本身，就是一个排斥工具。这个边界不是任何人的恶意外物，它是程序逻辑本身无法避免的必然另一半。

第二，与斯科特“国家简化”的区别——不是抹除，是让渡。斯科特的分析聚焦于国家推行的标准化项目对地方性实践和知识的主动消除（elimination）。强制村庄化、科学林业都是将复杂的、不可通约的地方现实强行塞入一个简单化的、便于中央控制的模子，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多样性被消灭了。而本文的“溢出”，更多描述的是另一种情形：系统并不需要去主动消除那些旧有的邻里互助网络、老水利人的模糊直觉或非正式的照料实践。它只需要不再去“看”它们。系统把制度资源、合法性与考核注意力，全部配置给它自己定义出的“可防御实践”——专业网格员的APP打卡、水库的标准化调度模型、政府购买服务的指标册子——那些旧有的、不标准的社会缓冲，就在合法的忽视中自生自灭。不是被国家消灭了，是被国家从“值得保留和滋养”的视野中让渡出去了。前者是主动的铲除，后者是被动的枯竭。机制不同，对应的制度改良路径也不同。

第三，与贝克“反身性风险”的区别——不必砸回来，直接由被溢出者承担。贝克的“飞去来器效应”指向一种风险的民主化：生态灾难和核辐射最终不分穷富，会砸回制造者自己身上。这种“报应机制”构成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道德内核。而本文的“溢出”则无情得多：它所制造的风险可以被高度选择性地导出，由那些在制度核算中最轻、最难以发声的边缘群体承担，而复杂社会体系的核心区域确实安然无恙。永定河上游的村庄被冲毁了，但下游的经济核心区防洪标准牢不可破。它不需要一个“砸回制造者”的闭环——“溢出”正是在风险和代价可以被精确转嫁、而系统核心区持续受到良好保护的意义上，才成为一套可以在无压力的安宁中持续运转数十年的逻辑。

第四，与“结构性暴力”的区别。加尔通的概念指涉权力结构对人的潜能的系统性压制，是宏观的、弥漫的、在和平时持续起作用的暴力形态。而“溢出”追踪的是一个具体的制度操作链条——一次达标率的统计、一笔河堤加固费的审计排序、一份服务购买合同的指标设计——并强调其杀伤性后果在特定灾害时点被一次性清偿。它不是常态的暴力，它是漫长的、程序合规的、无恶意准备之后，在极限事件中的集中体现。

正是这四个区分，使得“溢出”必须被独立命名。它不是“意外后果”的同义词——它在认知层面被系统“看见但不纳入”，而非在因果层面“未被预见”。它不是“国家简化”的翻版——它靠的不是消灭，而是渐进的不再滋养。它不是“反身性风险”变体——它不需要砸回来，它只需要被精准转嫁。它不是“结构性暴力”的具例——它是危机清偿式的，不是常态弥漫的。

在后续的分析中，读者将看到，这四个辨别面如何在北京暴雨的一个个具体场景中被逐环兑现。而它们最终共同指向的那个不可还原的机制核心，本文将概括为：一个致力于精准保护的体系，在划定“可防御区间”的同时，就必然地、毫无恶意地制造出这个区间之外的“被让渡空间”。灾害发生时，这个空间里的居民不是在物理上未能抵达避难所——他们是在漫长日常的制度操作中，一步、一步、被推到了再无避难所可言的轨迹上。

三、不在“漏掉”，在“不再滋养”：制度剪除社会缓冲层的三重机制

现在，我们需要把那个笼统的“系统”概念打开，看进它内部的具体运作。现代灾害治理体系的日常运转，大致悬挂在两套互相咬合的操作逻辑之上。它们贯穿于水利工程的设计、预警信息的发布、应急物资的储备、临时安置点的开启，直至事后救助款项的划拨。在日常运转中，它们不仅被视为技术上的必要，也常被当作“负责任”的明证——前者保证每一个被指派的任务都没有差池，后者保证每一分公共支出都物有所值。而正是它们的精密运转，在执行保护的同时，也执行着一种系统性的、不再滋养。

我把它们分别称为“不出错”逻辑与“不亏损”逻辑。但本文要论证的核心不止于此：这两套逻辑在运转中，不仅筛选出谁可以被保护，它们还在同步绞杀那些原本可以充当社会缓冲层的非正式实践与制度冗余。这个“绞杀”才是本文论证的脊梁——它提供了从“制度让渡”到“灾害伤亡”之间的那条必然性纽带。一个社区不仅因为不出错和不亏损而被划在了可防御区间的外部；它更被剥夺了那些本可以在危机中自救的最后一点能力。灾害来了，不是没有人能救他们，而是那些曾经能救他们的人和事，已经在常年的制度运作中被成片剪除。

3.1 “不出错”：标准化如何定义“看见”的边界

“不出错”逻辑的核心指令可以这样表述：每一个被明确定义出来的任务，都应当被尽可能没有偏差地执行到位。

这似乎无可反驳。防汛责任人要保证分派的河段不出险情；气象预警发布要达到规定的覆盖率和时效性；应急物资发放要对照清单逐项签字画押。这些事情上追求“不出错”，就是一种负责的、可被追溯的认真。

但这里有一个隐蔽的结构性转折：当一个体系以“不出错”作为评价执行的最高准则时，它倾向于把所有它要负责的行动，都逐步压缩进那些可以被明确定义、可以被绩效考核、可以在事后被追责的“标准任务”之内。凡落在这些任务边界之外的——无论多么急迫、多么重要——在问责逻辑中都不构成一个正式的“错误”。一个没有被文件规定为“必达项”的举措，即使后果悲惨，也不是“出了错”，而是“不在职责范围内”。

于是，“不出错”的精密运转，便在保护清单的内与外之间，切出了一条生死攸关的边界。清单内部是被台账登记、被任务分配、被考核覆盖的“可防御区间”；清单外部，是一片被制度性地搁置在“不负责”状态中的盲区。盲区本身并不致命——任何制度都有盲区。致命的是，当“不出错”成为一条准则时，跨出清单去处理未定义的问题，对执行者本人而言，就变成了一种需要承担巨大个人风险的越界行为。一个人可能因为做出制度之外的正确决定而遭受惩罚——不是因为他做错了，而是因为他做了没有被授权、没有被程序保护的事。久而久之，这个系统培养一种根深蒂固的行为惯性：在自己的“责任田”内做到零差错的精确，而对“责任田”以外的事，保持严密的、有制度支撑的视而不见。

但更致命的事情，发生在这些未被定义的对象上。他们不只是暂时不被看见。他们被剥夺了一种更根本的东西：被看见的可能性。

3.2 “不亏损”：核算如何磨钝生命在预算表上的分量

另一只推手是“不亏损”。它的核心指令同样有着不容置疑的表面合理性：公共支出的每一分钱，都应当有其可量化的价值产出，能够经得起审计的逐笔审视。

这个逻辑嵌入在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应急资金使用的全链条中。一座水库要不要加固、一条河道要不要疏浚、一个避难所要不要立项——都必须先通过成本收益分析：项目的投入，能否在将来可能避免的灾害损失中“回本”？如果下游保护的是一个年产值数百亿的高新开发区，这笔账算起来容易。如果下游保护的是几个人口持续外流、日渐空心化的村庄——老房子在资产评估表上几乎不值什么钱，居民以高龄务农者为主，不产生显著的GDP——那么在同一个成本收益分析框架里，同一个等级的防护工程，就可能被判定为“不适合上马”。

这里发生了一个隐蔽但决定性的转换：当“不亏损”从理财准则上升为衡量一切公共行为正当性的尺度时，它实际是在为保护对象的经济价值排序。生命本身没有价格标签，但这种核算逻辑里，生命被按其所捆绑的资产价值、税收贡献、经济产出间接地标了价。那些

附着在经济增长引擎上的生命，因为其背后资产的沉重沉没成本，获得了更高保护优先级的“配给”；而那些资产价值微弱、不在经济要害部位的人，则在核算表里变“轻”了。他们不是被宣布不值得保护，而是在每一次资金分配的程序中被系统性地、合法地排到了队列的末尾。

这个排序之所以如此难以被察觉和挑战，是因为它并不表现为一句“我们放弃了你”的宣告。它只表现为一份份年终决算报告上，财政资金的“优化配置效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3.3 社会缓冲层的三重剪除：将韧性连根拔起

如果“不出错”和“不亏损”仅仅彼此咬合、在各自的逻辑轨道上运行，它们造成的损害或许还相对有限。问题在于，它们协同运转时所做的，远不止是筛选“谁该被保护”。它们在同步地——并且几乎是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剪除那些本可以在极限时刻充当最后一道防线的社会缓冲层。这种剪除是本文论点的脊梁：它构成了从“被制度让渡”到“在灾害中丧命”的必然性链条。它不是一种修辞，而是三个可以被独立追踪和验证的机制。

第一重剪除：“不可能”的日常照料。在灾害到来之前，就有一些生命的脆弱程度，本可以通过非正式的邻里照料得到缓解。但社区里的旧有互助网络——那位每天顺便敲敲独居老人房门的邻居大婶，那个记得所有孤寡老人住址的退休村干部——一旦被服务采购合同所替代，就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采购合同要求标准化的服务交付：每周上门两次，每次打卡记录，拍照上传留痕。这些标准确实让服务质量“可控”了，但也同时宣告：任何超出合同范围的服务、任何合同覆盖不到的边缘对象、任何交付物清单之外的人情联络，都不再有任何制度力量去维系。旧的人情网络因“不规范”而解体，新的专业体系却因为核算逻辑的刚性，不能、也不会去照看那些从未被写进指标册子的人。于是，保护升级了——从“不可靠的邻里帮忙”升级到“专业的上门服务”。但保护范围的边界，也前所未有的收缩到指标册子的边界上。那些册子之外的人，不是被推出去的，是被制度性地留在了“没人有义务去拍门”的真空中。

第二重剪除：“不可行”的就地避险。灾害发生前数十年，某个上游村庄之所以长期在河岸边存在，不只是因为贫穷，更是因为某种地方性的避险智慧——知道哪一段河岸更容易先塌、哪条后山路可以更快绕过去。但当河堤加固和危险区划定的决策，被完全收归到以经济资产密度为核心变量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之内时，村庄作为整体被判定为“不划算”。不修堤是符合逻辑的。组织居民进行定期的防灾演练或整体易地搬迁，又因为缺乏财政项目的“可核算性”而被一拖再拖。于是，在两套逻辑的对接处，村庄进入了一种诡异的悬置状态：既不值得加固防护，又无法获得主动降低风险的投资。几十年过去，地还是那块危险的地，资金还是没有流向这里，而一代人就在这种悬置中长到了白头。

第三重剪除：“不该说”的现场直觉。在应急响应的现场，最宝贵的资源往往不是一个更完善的模型，而是一位老水利人几十年的洪水直觉——那种“今年的水不太对劲”的模糊警觉。但现代治理体系对决策标准化和证据基础的要求，几乎让这种“无据”的直觉丧失了合法性。一份没有数据支撑的动员申请，在审计面前是不合格的；一次基于缺乏统计显著性的预感而做出的提前调度，对决策者本人可能是足以断送职业生涯的冒险。当预警系统、决策模型和运筹分析都在鼓励一种高度精确的、依赖于可量化信息的操作理性时，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经验嗅觉，就在这个体系中失去了立足之地。这构成了第三重剪除：系统不只抹除了缓冲区，它更抹除了在缓冲区失效的时候，那些能够突破常规、凭直觉做出挽救判断的最后一种可能。当2023年7月31日的暴雨超出所有历史模型时，山区的独居老人的屋里，响起的声音不是报警，也不是谁的敲门声，而是洪水撞碎木门时那种沉闷的破裂声。

这三重剪除，并置在一起，就清晰勾勒出那张溢出之网如何从纸面走向现实。第一重剪除决定了“没人会敲门”；第二重剪除决定了“敲了门也无处可去”；第三重剪除决定了“即使专业救援赶来，也可能因为决策的延宕而赶不上”。正是这三重剪除的逻辑锁链，而非任何个体的恶意或失职，构成了从“制度让渡”到“灾害伤亡”的精确路径。那些死去的人，不是被一个错误的决定推向危险的，而是被成千上万个完全合规的、负责任的决定，一步、一步、推到了再无退路的位置。

四、案例：2023年北京暴雨如何让溢出区现形

理论的骨架已经铺好。这一部分，我要把这套分析工具放回到泥土里，用一次真实的、近期的、有丰富公开信息可查的灾害事件——2023年7月底至8月初的北京“23·7”特大暴雨洪涝灾害——来展示“溢出”的全链条发生过程。选择这场暴雨，不是因为它特殊，而是因为它极其典型地展现了：一个高度精密、资源充沛的现代治理体系，在遇到超越设计标准界限的冲击时，其“不出错”与“不亏损”逻辑如何协同运转，精确地、毫无恶意地、却不可避免地让溢出区中的人与社区承受了最惨痛的打击。需要说明的是，下文涉及的匿名老人、上游村庄及其内部决策场景，均为在官方灾情资料基础上用于展示机制的综合性重构，不对应某一可识别个案，也不构成作者的田野调查记录。

4.1 背景：这场雨和它经过的两张地图

2023年7月29日至8月2日，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影响，北京遭遇持续83小时的特大暴雨。截至8月8日24时，北京市官方通报全

市因灾死亡33人、失踪18人，近129万人受灾。大量山区村庄一度断电、断水、断网，与外界完全隔绝。

灾后，官方通报列出了几项问题：山区应急通讯保障不足、部分水利工程设防标准偏低、城乡结合区域应急管理存在短板。这份列表本身没有错，但它用笼统的“不足”“偏低”遮蔽了这些欠缺的具体生成史。本文要做的，就是把每一处“不足”都拆开来，看它是在哪个决策环节、被哪套逻辑、以怎样的“正确”动作生产出来的。

4.2 预警达标的那一夜：谁在信息的溢出区？

暴雨发生前，北京的预警发布系统是国家级的标杆。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全市防汛系统按应急预案迅速启动，地铁站装了挡水板，下沉立交桥派了专人盯守。在城六区，这套系统运转得近乎完美。

然而，把镜头推向城西的门头沟深山区，看见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幅画面。这里的许多村落分布在狭长的谷地中，唯一的外联通道是沿河的公路。暴雨引发的山洪在凌晨突然冲下，道路被整段冲毁，一些村庄与外界的通讯在极短时间内全断。在这些村庄里，住着大量高龄独居老人——子女进城工作，留下的多是七八十岁的空巢者。据灾后公开报道，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洪水灌进屋时还坐在炕上。他屋里没有电视，只用一台只能接打电话的老年手机，唯一的信息渠道是村干部偶尔上门时的口头传信。当夜山洪来得太急，村干部本人也被困在了对岸，无法过河。

在这个场景里，预警信息确实发出去了，并且完全达到了考核的覆盖率、时效性指标。“不出错”没有被违背。但那条预警信息，推送到的是智能手机APP上，是电台广播，是微博页面。它精确地抵达了它能抵达的那部分——以中青年为主、拥有稳定网络连接、能够迅速将信息转化为行动的“标准接收者”。对那些山区独居老人——没有智能设备、听不到即时广播、村里的传信通道在暴风雨夜物理中断——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无法被“标准覆盖率”概念所感知的信息真空。

这里没有一个犯人。这里是“不出错”逻辑织出的网的网孔在现实中的一次兑现。体系将“预警信息发出去了”等同于“预警任务完成了”，而“任务完成”的定义，被限定在向那些已经被技术系统识别为“可接收者”的终端上。老人的不在场，不是疏忽，而是“可防御区间”在通讯维度上的精确边界。他在边界之外。

4.3 永定河上游的村子：几十年核算的最后一笔清偿

再往上游追溯。这次暴雨中，受灾最惨烈的村庄之一，坐落在永定河一条支流的河岸上。在下文的分析性重构中，这个村庄的房子紧贴河道，有些地基几乎就在水边。洪水到来时，河岸塌陷，房屋成排倒入湍流。

为什么一个百年村落，会被允许在如此危险的位置长期存在？本文将一个可检验的机制性答案放在防洪规划与资源排序的长期作用中。

在这一机制性重构中，永定河及其支流的防洪规划，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修订。每一次制定规划，都必须编制详尽的防洪评估和经济效益论证。在这条支流流经的区域内，经济价值最高的是一路往下的城镇和交通干线。它们被列为“重点防护对象”，分配了较高的防洪标准，有专项资金进行河堤加固和河道疏浚。而上游的这个村庄，流域面积小、人口日益稀薄，在历次成本收益分析中都排在最末梯队。根据一般的防洪经济评估方法，一个保护对象的“可防御投入”上限，大致与其所保护的资产总值成正比。如果被保护地区的总资产——房屋、基础设施、企业产值——在评估中不及堤防投资的相应比例，项目就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对于一个日渐空心化的深山老村，账面上的“回本”几乎不可能达成。

一个闭环就此形成：因为经济权重低，被排在防洪投入优先级的末端；因为投入低，河岸从未得到系统加固，地点始终危险；因为始终处于这种脆弱的危险点上，村庄无法吸引投资、发展产业，也无法在规划中获得更高的行政和保护级别。几十年下来，没有人在任何一个环节决策说“放弃这个村”。只是在每一次审慎的、负责任的核算中，这个村都恰好被排在“本轮暂缓”的那一栏。每一期的暂缓都被记录在案，每期都有充分的、可审计的理由。

在本文构造的分析情境中，2023年7月31日之夜，洪水漫过了那条低标准的土坝，卷走了土坝后面的人与房。这场灾难，落到这个具体的村子里，不是天降的意外，而是几十年精打细算的必然溢出——那些“不亏损”决策中被节省下来的加固费，在日复一日的安宁中挂在账本贷方，而在这一夜，由洪水在借方一笔提清。

4.4 被制度剪掉的缓冲层：从“敲邻居门”到“APP打卡”

在这次暴雨中，另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是：当一些深山村庄与外界彻底失联后，最先启动救援的，往往不是远方的专业队伍，而是本村或邻村的年轻人自发组成的小队。他们凭着对当地每一所老宅、每一条小径的记忆，在黑夜里摸黑把人从危房里背了出来。

如果只把它当作“邻里互助”来赞颂，就把这件事用得太轻了。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种互助，为什么只在这些“老村”还能幸存？

在那些已经高度流动化、原子化、被标准化社区治理体系完全覆盖的城郊地带，为什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形——灾民被困时，隔壁同样被困，却彼此不相识，无人敲门，无处求援？

答案，在于那种曾维系“顺便敲个门”行为的社会基质，在过去二十年中被逐步抽空了。城市化进程打散了熟人社区。基层治理在引入网格化与数字管理的过程中，用职业化、可考核的“上门服务”替代了过去邻里间模糊的、不计报酬的日常互助。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这类服务通常有明确的考核要求：受益人数、服务频次、每次服务的项目清单、拍照上传留痕。这意味着，只有被事先列入受益人名单、符合“高龄独居”或“特困”等标准定义、且住在服务可及区域内的人，才能被这套制度覆盖。那些住在没有门牌号的违章建筑里、不符合低保审核标准、或暂住在户籍地之外的人，从一开始就被挡在了项目指标的筛选门槛之外。旧的那套——靠“我知道那间老屋里还睡着人”的本地记忆去把人拖出来的能力——被制度判定为“不标准”“不专业”“不可考核”，慢慢退出了社会生活的正式空间。而接替它的新制度，虽然实现了更好的覆盖率，却也同时宣布：那些不在名单上的人、那些发生在两次探访间隔期内的事，将不再有制度之外的人去操心。

这就是溢出区在社会层面的形成过程。当专业网格员自己在暴雨里也出不来的时候，那些被按“不标准”剪掉的人情网络，就在一夜之间暴露出它被剪掉之后留下的真空。这片真空中，曾经能救人。现在不能了。

4.5 案例小结：溢出不是意外，是被让渡

2023年的这场暴雨，是一次高度精确的溢出事件。它没有随机地击倒一些人而放过另一些。它准确地命中了：上游那个因“不划算”而几十年没有牢固堤防的村庄；居住在通讯盲区、手持老年机、不在预警推送算法覆盖范围内的独居老人；以及那些曾因“不够标准”而被挤出、又未能在专业化治理中再生的邻里互助能力。每一个环节上的决定在当时都是正确的、负责任的、经得起审计的。它们不包含恶意。但就在这个“正确”里，一个让渡空间被一步步地生产了出来。

五、制度的脆硬：自我优化的回环如何击穿自身

如果“溢出”仅仅是筛选出边缘群体，把代价转嫁给他们，那么这篇论文的论点还停留在一个尽管深刻却仍然可预期的层面。但溢出的机制不止于此。那套“不出错”与“不亏损”的优化逻辑，在剪除社会底部缓冲层的同时，也在无声地侵蚀着系统顶端应对极端不确定性的能力。代价不仅被转嫁，它还会以一种不曾被预期的方式，削弱优化者自身。这一点，是将分析从“暴露不公”推向“制度性自反”的关键一步，但必须谨慎地限定其论证效力。

5.1 被标准化的判断力：从经验直觉到模型盲区

在这次北京暴雨的应急响应中，有一个典型的困境。水库调度人员严格依据水文模型输出的预测进行决策。模型输入了所有按标准采集到的数据：上游来水、库容、下游河道水位。计算精准无误。但模型里缺失了两个东西：一是几座非法但现实存在、建在行洪区内的小型建筑物对水流的阻挡效应——它们因未获审批，从未被纳入地理数据库；二是几位老水利人凭几十年经验产生的直觉——他们觉得“今年的水不太对劲”，但说不出模型上哪个参数可以捕获这种“不对劲”。

按照“不出错”的标准化操作规程，调度必须依据模型。凭直觉擅自调整，是越权的、无据的。结果，模型因为缺少上述信息，给出了一个偏乐观的分洪时刻判断。等到现场情势急转直下，错过的调度窗口已经被洪水冲走了。这不是偶然的技术事件。它是“不出错”逻辑执行到极致后所生产的认知溢出：逼着最有经验的人放弃他们无法被写入标准作业程序的经验，转而依赖一个完美却信息贫瘠的、只纳入了“标准化”数据的决策工具。在正常运行区间内，标准化模型稳定可靠。但危机恰恰超越正常运行区间。在那个区间里，起死回生的往往不是统计显著性，而是一两个人基于多维模糊信号的“感觉不对劲”——而这，恰恰是被标准化制度定义为“不科学”、并成体系排斥的认知方式。

5.2 被核算驯化的勇气：为什么没人敢说“我不知道”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决策链条的上层。现代治理对“决策科学化”的强调，无意中形成了一种不可挑战的核算文化：任何资源申请，都必须附上一份有模有样、带详细预测数据的论证报告。即使面对前所未有的极端不确定性，你也不能在报告里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强烈认为我们应该额外准备一笔钱，以防最坏情况”——这句话在审计眼里是无效的、无法通过的。你必须把不确定性翻译成确定的风险概率，把最坏情况换算成成本收益分析表格里的数字。

这个过程逼着每一个有经验的决策者学会用数据包装自己的直觉，甚至逼着他们放弃那些无法被数据化的直觉。结果，当真正的黑天鹅逼近时，整个系统上下，没有人敢于在没有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单凭“感到极度不安”就发起一场昂贵的提前动员。这不是懦弱，这是在长年累月的核算文化压力下肌肉记忆的自然反应：永远不提交一份会被审计打回来的、软弱的、无法自证其理的用款申请。

5.3 脆硬：优化到极致之后的潜在风险

追求日常效率无可厚非，追求预算平衡天经地义。但当每一个环节都在为常态运行调优、都在剔除“冗余”——冗余的人、冗余的信息渠道、冗余的决策权限、冗余的物资储备——时，整个系统就进入了一种高度脆硬的状态。它在平常的运行区间里显得高效、整齐。但遇到一次超出既往经验的冲击时，它因为失去了那些平日里“用不上、费钱”的冗余层，而有可能完全丧失吸收冲击的弹性。

这里必须明确论点的边界。本文不是在断言“不出错与不亏损的优化逻辑，必然地、普遍地导致系统全盘瘫痪”。我承认，这种“系统自反”的因果关系，在此仅以单一的极端案例呈现，尚未经过大样本的严格检验。因此，本文第五部分的论证，其恰当定位是：提出一个可被后续研究检验的理论假说——灾害治理的日常优化逻辑，在剔除了冗余资源、冗余判断与冗余行动者之后，有可能在超越设计标准的极限环境中，削弱系统自身的应急处置能力。这个假说需要更多案例的比较研究来验证——例如，在此次暴雨中，是否有保留了更多冗余缓冲、更少被标准化收紧的系统，其应急表现确实不同。但作为一次理论开端，本文能够做的事情是把这个假说的逻辑推演完整，并指明它等待检验的方向。

灾难不止击穿了那些被溢出的人。它也有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削弱那个拒绝为自己保留一点“错误空间”的系统本身。这就是自反的另一面：一个追求在一切可预见风险中都“不出错”的体系，恰恰在面对它无法预见的风险时，可能因为失去了感知危险的直觉、敢于承担风险的人、以及容纳意外的冗余，而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这个命题的成立与否，需要被更系统地检验——但本文的工作，是把它从模糊的忧虑，变成一个可以被操作化追问的、有具体因果链条的理论假说。

六、反驳与回应：批判的边界在哪里

搭建到这一步，本文必须面对一个最严肃的诘问。我把这套优化逻辑指认为“溢出”的制造者，把它描述为一张筛人的网，还论证它在日常运转中剪除了本可救命的社会缓冲。那么一个自然会被提出的质疑是：难道我们要放弃标准化吗？难道公共财政不需要审计吗？难道回到前现代的、靠个人意志和人情关系来治理灾害的状态，是我们想要的出路吗？

这个质疑不是误解。它是触及本文论证合理性的根本追问。如果不能正面回应，对“不出错”与“不亏损”的批判就极易被曲解为一种反智的、民粹的、甚至危险的倒退呼吁。而本文要做的，恰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重新划定边界。

6.1 反击的不是标准，是标准的绝对化

首先必须明确：标准化毫无疑问地是现代灾难治理的伟大成就。正是它，才让气象预警能在几秒钟内覆盖千万台终端，才让救灾物资可以从中央仓库有条不紊地发往任何一个坐标点位。没有标准化，就没有任何可以言说的“负责任”。本文所反对的，从来不是标准化本身——本文反对的是标准化的绝对化：把能否被清晰定义、能否被写入操作手册、能否在事后被追溯考核，奉为评判一个行动是否“成立”的唯一前提。

在灾害的极限场景，这个区分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一个老人住在一条没有门牌号的小巷里，一条暴雨预警无法以“标准流程”触达他。那么，要不要捅破这层合规盾牌——由责任人事先派出一组人，逐户排查“非标点位”？这在现有体系里，是对执行者充满追责风险的越界行为：做了，没有标准依据；不做，不会违纪。本文的主张是：制度应当主动为这类“越界”行为预先设置一块免于因程序不合规而受罚的保护空间——不是废除标准，而是在标准旁边，为“正当的越界”开一扇受保护的小门。

但我必须同时坦承：即使开了这扇门，新的张力也会在新的地方出现。“正当越界”的判定本身，很可能在官僚系统中演化为一套新的合规压力——要证明你越了界，还是得填表、报批、留下证据供日后审计。那些最难以叙述、最模糊、最无法自证的情境，仍然可能被新的保护机制所排斥。这不是一个致命反驳，这是一个必须被承认的事实：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一劳永逸地消灭溢出；能做的最好的事，是让此刻最致命的那类溢出有一个被听见、被讨论、被修正的制度通道。今天打开的这扇门，会在未来的某个极限情境中暴露出它自己的新盲区——到那个时候，再打开下一扇门。这不是制度的失败，是制度在面对不可消除的矛盾时所呈现的真实生命状态。

6.2 反击的不是审计，是对“不可核算物”的驱逐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不亏损”。审计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公共资源被侵吞、被浪费。它是廉政的基石。本文反对的，不是对支出的合理核算，而是将经济可核算性上升为衡量一切事物正当性的全能尺度。

有些东西，确实无法进入成本收益分析的表格，却不意味着它们是虚妄的。一个社区里，老人之间几十年养成的日常串门，没有产生GDP，不在任何社会服务采购合同的交付物清单上，没有通过任何绩效评估。但它在灾害中的价值，可能比一座耗资千万、按标准达标、却无人值守的应急广播站更真实。本文的主张是，公共决策中应当重新为这种“不可核算物”保留合法的生存空间——承认有些账，不能仅以财务语言来记，有些价值，不能因“不可核算”就被驱逐出公共资源分配的视野。

6.3 在承认矛盾中留住冗余

由此，本文的建设性结论就成型了。一个真正具有韧性的灾害治理体系，不是一栋用无限精密的标准化砖块盖到天上去的塔，而是一座懂得在骨架之间预留伸缩缝的建筑。这些伸缩缝，就是制度性地、预先地在问责体系内，为下列“异常行为”留出的合法空间：为无法被台账覆盖的边缘对象预留独立的非标应急资源；为凭直觉要求额外动员的一线决策者提供一条简化事后审查的特别通道；在防洪标准的制定中，将“避免人员伤亡”从成本收益分析的因变量中抽出来，作为一项独立硬约束——不因下游“穷”而降低防护等级。

这不是浪漫的人道主义。这恰恰是承认：一次在账面上“不划算”的抢险失败，其引发的社会信任崩塌与长期合法性损伤，代价远高于任何核算数字。为“不标准”和“不划算”留出空间，不是对效率的否定，而是对效率边界的诚实。它也不承诺一个消除一切溢出的乌托邦——它只是承认，在新的矛盾注定会在新的地方出现的前提下，这一步仍然是必要的。

七、结论：看见那片被让渡的空间

灾害不是突然之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厄运。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精心构建的系统，在划定“什么可以防”的同时，被必然制造出来的另一面。溢出——这个概念要捕捉的，正是这种在尽职尽责的日常中，被精确地、毫无恶意地、一笔一笔生产的制度性让渡。

本文所做的工作，是为这种让渡提供一份生成机制记录。它追踪了现代灾害治理体系中，“不出错”与“不亏损”这两把织网的梭子，如何在划定可防御区间的过程中，必然地织出同样精密的溢出区。它借用2023年北京暴雨的真实案例，展示了这种溢出如何在预警达标率的完美数字里、在防洪投入的审慎排序里、在社区互助被制度化替代后的真空中，被逐环执行完成。它的核心论点是，这种制度运作不止在筛选“保护谁”——它更在剪除社区用以自救、应急判断得以发生、非正式互助得以幸存的那些缓冲层。这个三重剪除的机制，构成了从“被制度让渡”到“在灾害中丧命”的必然性链条。

本文的理论贡献可以被精确地定位为：在灾害社会学的“分配”范式与“生产”范式之后，在与默顿的意外后果、斯科特的国家简化、贝克的反身性风险以及结构性暴力等最接近的经典概念进行严肃对质之后，切出一个新的辨别维度——“溢出”。它要揭示的，不是“不公”本身，而是“公”在执行自己的保护逻辑时，所必然划定的那个不再主张责任的让渡空间。它要命名的，不是排斥（那需要一个排斥者），而是被从“可防御”的认知框架中让渡出去，从而在灾害中丧失制度性回应资格的那个过程。

当然，本文只是一次理论建构加单个案例的深度解剖，并非大样本的因果推断。它无法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政治体制或行政文化下，“可防御区间”的边界会被划在什么不同的位置，溢出区的尺度会如何被媒体自由、选举压力或地方自治传统所放大或收窄。它也无法预判下一场暴雨会具体击穿哪个村庄。但它给出了一个可供检验的分析程序：看谁在标准化任务清单之外，看谁被成本收益核算推到保护末梢，看哪些曾能救命的社会缓冲层已经在常年的制度优化中被成片剪除——那些地方，就是下一次灾害的溢出区最先被撕开的口子。

最后，本文的生命力系于一个朴素且可被检验的证伪条件。如果有一天，同等物理强度的灾害在不同地区造成的后果分布，不再能够依据“被溢出的人口比例”“低经济权重社区的分布”以及“制度性缓冲层的缺失程度”来事前预测——如果那些被划在核算表末端、被排除在服务指标册子之外、其自救网络已被制度性剪除的人与社区，不再成比例地承受最沉重的打击——那么本文所揭示的“溢出”机制，其普遍解释力便开始失效。因为到那时，它描述的就不再是现实中的一种结构性必然，而只是人类曾在某个历史阶段里，一手划下、又一手承受的那些可避免的代价。

材料说明

本文关于2023年北京“23·7”特大暴雨的时间、伤亡与受灾规模，依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发布材料及应急管理部年度灾情通报。文中的匿名独居老人、永定河上游村庄、防洪排序和内部决策过程，是在公开事实背景下用于展示“溢出”机制的综合性重构，不对应可识别个人、村庄或会议记录，也不构成作者的田野调查。

对“预警达标”“成本收益核算”“邻里缓冲”等制度机制的描述属于理论分析；未经下列来源直接支持的细节，不应作为具体事件的经验结论引用。

参考文献

- [1] O' Keefe P, Westgate K, Wisner B. Taking the naturalness out of natural disasters[J]. *Nature*, 1976, 260: 566–567. DOI: 10.1038/260566a0.
- [2] Wisner B, Blaikie P, Cannon T, Davis I.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M].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 [3] Merton R K.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36, 1(6): 894–904. DOI: 10.2307/2084615.
- [4] Merton R K.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J]. *Social Forces*, 1940, 18(4): 560–568. DOI: 10.2307/2570634.
- [5] Beck U.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M]. London: Sage, 1992.

[6]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Scott J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Galtung J.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69, 6(3): 167–191. DOI: 10.1177/002234336900600301.

[9]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北京通报本次特大暴雨灾害过程及应对工作情况[EB/OL]. 2023-08-09.
https://jrj.beijing.gov.cn/jrgzdt/202308/t20230810_3219475.html.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2023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EB/OL]. 2024-01-20.
https://www.mem.gov.cn/xw/yjglbgzdt/202401/t20240120_475696.shtml.

[11]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R]. Geneva: UNDRR, 2015.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结构性暴力的硬边界

加尔通把结构性暴力界定为无可指认施暴者、由社会结构本身造成的可避免伤害；法默进一步论证这种伤害沿既有的贫困与权力分布落下。这是“溢出”真正最近对手，不划界，本文极易被读成结构性暴力的灾害版。三条分野：其一，结构性暴力是结构的持续状态，溢出是一次可定位的划界动作——它有决策时点、有责任主体、有留痕的技术文件（预警名单口径、河堤加固排序、服务指标册子）；其二，结构性暴力强调无人可归责，溢出强调恰恰人人合规、责任被程序性地免除，这是两种不同的免责机制；其三，结构性暴力的伤害是弥散累积的，溢出的伤害在灾害时刻一次性清偿。第二条最关键：溢出不是权力的隐形，而是权力用尽职的形式把某些人写出定义之外，因此它可被文件层面追溯，而结构性暴力通常不能。

增补二：溢出区的可编码指标

证伪条件已经点出三个变量，但仍停在概念层面。可编码形式：溢出人口比例——辖区内不满足现行预警、救助或服务纳入口径的常住人口占比，直接从口径文本与人口结构交叉得出；核算末位度——防护投资排序中该单元的分位，可从公开的工程排序与预算文件读出；缓冲层残余——单位人口中仍在运行的非正式互助关系密度，可用互助行为发生频次的抽样测量。三项都可在灾前取得，因此本文所声称的事前预测力才是一个可被兑现的承诺，而不是灾后回溯的解释。

增补三：批判的边界

本文不反对标准，不反对审计，也不主张回到凭经验裁量的时代。标准化让大规模保护成为可能，审计让权力可被追问。它反对的是两件更窄的事：把标准的覆盖范围等同于责任的覆盖范围；以及把不可核算之物当作不存在之物予以驱逐。这一限定同时给出本文不能承担的推论：它不能推出减少标准即可减少牺牲，因为标准撤除后填补真空的可能是更任意的裁量。可行的方向只是在标准之外为不可核算物保留一个正式的记录位置，使溢出区至少可见。

增补四：与作者已发表工作的分野

《制度代偿的悖论》处理的是制度替人承担不可分责任后，信任的生成机会被冷却；《照护的实体性离身》处理的是照护行为与人格内核的脱钩。两篇的病灶都在制度所覆盖之内——被覆盖者失去了某种只能亲自完成的东西。本文的病灶在覆盖之外：被划出定义的人根本未进入制度的关切范围，他们不是被代偿掉了什么，而是从未被主张。这一分野决定了两类问题的解法方向相反：前者要为不可代偿之事留白，后者要把被让渡者重新纳入定义。混淆两者，会把一个纳入问题误治成一个留白问题。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实验文献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 1969.

Paul Farmer, Pathologies of Power: Health, Human Rights, and the New War on the Po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Robert K. Merton,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1936.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Suhrkamp, 1986.

Michael Power, 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